

浅析国奉战争

张安庆

1925年12月,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在关内的势力直隶(今河北省)军务督办李景林之间曾有一场激战,史称国奉战争。

李景林是奉系重要将领,在派系林立的奉系军阀集团中属于新派中的大学派(土派),受到奉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老派和新派中的士官派(洋派)的排挤。为保有直隶地盘,他曾反对张作霖对国民军用兵。因而,李景林曾经暗中参与奉系重要将领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反对奉系张作霖、杨宇霆集团的秘密活动,并在郭松龄公开倒戈反奉后,于1925年11月25日发表通电,指责张作霖“好争喜战”,劝张下野,把权力交给张学良^①。然而,仅仅过了10天,风云突变,李景林又通电声讨冯玉祥,从而导致国奉战争的爆发。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李景林在数日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呢?这个问题还得从考察国奉矛盾和斗争的全局中来寻求答案。

发生在1924年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阵前倒戈,回师北京,另组国民军,而奉军亦趁势猛攻,从热河一直打到天津,致使吴佩孚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战败,于11月3日浮海南逃。国奉双方妥协的结果,由皖系头目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执掌北京政府。但这时在组织内阁和划分势力范围等问题上国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已经显露端倪。到1925年,张作霖为实现其扩张野心,年初借口支持皖系卢永祥反对直系齐燮元把奉军开到长江流域,4月又施加压力让段祺瑞任命奉系张宗昌督鲁把山东攫为己有,5月更加派大批奉军入关,分驻京奉、京津、津浦各线,不断逼迫国民军,国奉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国民军将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曾力主反击奉军的逼迫,但是冯玉祥考虑到这时张作霖正派人拉拢吴佩孚,为了避免促成这两个人的联合,极力主张对奉系采取忍让方针,并决定将京郊西苑、北苑及通州等地的营房让与奉军驻扎。所以,这时由于长江流域直系势力的存在,国奉之间还暂时维持着表面的“团结”和“合作”,但实际上已经是貌合神离了。10月,浙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虽然通电呼吁“和平”,表示“中立”,但骨子里是支持孙传芳进攻奉军的,并且暗中有南北夹击奉军的默契。老奸巨滑的张作霖深知从控制中央政权——北京政府这个全局来看,其主要对手不是孙传芳,而是冯玉祥,因此,张作霖对孙传芳的进攻采取退让的方针,而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初则百般拉拢,继则广泛施加压力,意欲迫使其就范,不成则诉诸武力。

11月上旬,张作霖派军长许兰洲前往包头,会见冯玉祥,逼冯公开宣言反直,并出兵协助奉军打孙传芳,或向湖北进攻,此事遭冯拒绝。冯玉祥11日写信给张作霖,指责张“迷信权利”,“过河拆桥”,为抢夺直、鲁、苏、皖四省地盘而驱逐共患难的“同志”,表示自己与吴佩孚有“不并立之事实”,没有宣言的必要,也“无论如何不受逼迫而宣言”,并愤慨地说:“如我兄认弟有合作之必要,有帮忙之必要,弟即来合作帮忙,否则惟有静待缴械而已。”^②

与此同时,奉军调兵遣将实施武力威胁。11月初在京津一带增兵四师,并对驻守北京的

国民一军采取三面包围的态势，即张宗昌在山东，扼津浦路；李景林驻保定、大名，阻断国民一军与国民二军的联系；由姜登选驻天津、沧州之间，郭松龄驻滦州一带。8日，奉军热河都统阚朝玺部一骑兵团，深入京兆域内三河县国民军防地，与鹿钟麟部京兆警备队发生冲突，国民军旋即退出，奉军占领三河县。廊坊奉军也与国民军防地更为逼近。国民军也不甘示弱，11月8日，国民军要人在京会议，表示“国民军有维持京师之责”，“不许他种军队有一兵一卒侵入北京”^③。国民二军岳维峻部一面增兵彰德、汤阴，准备以武力夺回保定、大名，一面向鲁西发动。这样，国奉矛盾表面化，京畿一带局势十分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但是，没过几天局势却缓和下来了，表面上是段祺瑞居间调停的结果，实际上双方都有不宜马上动手的缘由和苦衷。从奉方来说，东南新败之余，孙传芳的威胁并未完全消除，同时，手握重兵的奉军将领郭松龄、李景林又力主和平，反对对国民军用兵。从国民军来说，宿敌吴佩孚在汉口蠢蠢欲动，要避免两面受敌的困境，同时，郭、冯联合反奉正在酝酿之中，需要等待奉系内部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与11日来津的张学良举行会商，向鹿钟麟提出以国民军退出北京为条件，奉军撤出三河，鹿向冯玉祥请示后表示同意。13日，段祺瑞发布命令，提出“所有京汉铁路沿线应责成冯玉祥、岳维峻尽力维持”，“津浦铁路全线仍责成张作霖、李景林妥为办理”，“京畿驻兵，均着即回复此次军兴以前原状”^④。同日，张作霖致电段祺瑞，表示服从中央命令，宣称“已电商直鲁二省，停止战争，待中央命令，一切听钧座主持，所属各部，均严令撤退”^⑤。冯玉祥也电段表示：遵令即日飭部守京汉一带，沿路治安当与岳督办会同维持^⑥。随后，奉军撤出三河、廊坊，国民军也开始撤退北京附近的军队，鹿钟麟部第一师撤至丰台，宋哲元部第十一师退至通县、顺义一带，于是京畿形势转为缓和。

16日，奉方代表李景林、郭瀛洲，冯方代表张树声、王乃模在天津直隶督署会商，签订和平协定八项：“（一）奉军让出保、大，京汉路全线予国民军；（二）山西地盘由国民军支配；（三）国民军由海道输入之军用品，奉军不得阻碍；（四）京畿一带双方均不驻兵；（五）津浦全线归奉军；（六）长江下游为奉军发展地，上游为国民军发展地；（七）中央政权奉、国各半；（八）财政收入，奉、国平均分配”^⑦。22日，双方在北京成立镇威军和国民军联合办事处，推镇威军马翰荣、国军史之照为常任委员，处理执行和平协定的日常事宜。

在京畿周围形势暂趋缓和的时候，山东的形势却愈益紧张起来。原来，孙传芳发动对奉军的进攻时，曾约好国民二军岳维峻部（豫军）一致行动，孙军攻占徐州后，岳维峻于11月8日、15日两次到徐州，与孙传芳会商进攻山东事宜，决定豫军分兵两路进攻鲁西和鲁南，孙也派苏军白宝山部由海州进攻沂州，以牵制奉军。进攻鲁南的豫军在浙闽苏皖赣联军的配合下，19日分三路围攻韩庄，鏖战至午，奉军不支，韩庄遂为豫军和联军占领^⑧。进攻鲁西的是国民二军第九师李纪才部，该部11月中旬发动，一路进展顺利，克曹州，占济宁，到11月底已越过泰安进至济南城外的八里洼，济南形势十分危急。可这时，由于张宗昌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早与吴佩孚暗中勾结起来，吴指使靳云鹗策动岳维峻派往进攻鲁南的陈文钊、王为蔚、田维勤等直系旧部，脱离国民军，按兵不动，使张宗昌能集中兵力对付李纪才的进攻。12月初，张、李两军在泰安附近展开拉锯战，激战数日，李军终因孤军深入，后援困难，遂不支，退守大汶口以南^⑨。

国民二军在派兵攻鲁的同时，又派邓宝珊部北上进攻奉军李景林部，企图收复保定、大名，使国民军得以控制京汉铁路全线。不久，国奉之间的和平协定签字生效，邓宝珊部就作

为接收保、大的部队，继续北上。11月18日，当奉军李景林部一个师，正集中队伍，准备撤出保定时，奉命前来接防的国民二军邓宝珊部先头部队刘继邦旅，已经到达距保定二十五里的于家庄，并电知驻保定奉军，请其退防，以便接收。奉军派师参谋长高伟等前往交涉，提出待辐重及开拔手续完竣后，约迟5日，即可让防，刘继邦不允，仍要即晚入城。当晚，刘率兵一营向保定前进，车至保定站，遭奉军袭击，双方在保定西门外七里店短兵相接，互有伤亡，后奉军渐渐不支，乃退避入城。这时，国奉双方驻京代表史之照、郭瀛洲所乘专车到达保定车站，经调解，奉军于当晚撤出保定，国民军于翌日入城驻防^⑩。冲突虽然很快平息下来，但却使李景林大为不满，他在19日致段祺瑞的电报中说：保定让防，仅指京汉路沿线保定两地，至隶属直境之地方行政等事，不能一并让出，现豫军遽尔进占保定，有违明令，请执政主持^⑪。这就不能不加深其对国民军的猜疑。

当时，郭、冯、李反奉“三角同盟”正在暗中酝酿并接近成熟，李景林虽参与此事，但比较被动、勉强。郭松龄滦州发难，李景林虽曾通电劝张作霖下野，但实际上仍在观望、游移。李参与反奉同盟的根本目的，是保住直隶地盘并向热河发展。但是，11月30日奉系热河都统阚朝玺迫于郭松龄的压力退出热河后，冯玉祥派宋哲元部开赴朝阳，据热河为己有，李景林不能不大失所望。而且，国民二、三军邓宝珊、徐永昌部因不了解“反奉三角同盟”内幕，企图利用奉系内变抢占地盘，不仅急于接防保定与奉军冲突，且对撤出保定的李景林部尾追不舍；国民一军张之江部又进驻丰台，12月2日更开到落堡，并一再向李提出假道天津出关援郭的要求，这就使李景林更加怀疑国民军是要乘机抢占直隶地盘。热河未能到手，直隶又将不保，完全违背他参与反奉同盟的初衷，因而对国民军更为不满。

这时，张作霖所部奉军正被倒戈反奉回师关外的郭松龄部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为了分化“反奉三角同盟”，张作霖派许兰洲到津，劝李景林不要助郭倒张，并让李母也从奉天写信给李，嘱勿助郭^⑫。与此同时，李景林又接到天津日本驻军小泉司令官转来东京和关东军表示“郭、冯的军队，决不能进入奉天”^⑬的讯息。

正是上述因素，促使李景林决心背弃共同反奉的诺言，与国民军一决雌雄。李景林态度的急剧变化，在他12月2日发表的通电中已有所反映，他宣称：“景林职在守土，保卫地方，此后倘有对于直隶，扰害秩序，破坏和平者，景林戎马半生，自信尚可周旋，惟有率我健儿捍卫疆土”^⑭。到3日，当冯玉祥派熊斌等赴直隶督署会商，要求李景林就合作援郭反奉表明态度时，李竟拍案大喊：“我表明态度，就是讨伐冯玉祥”^⑮。并下令将熊斌等扣压起来，声言处死，后经左右劝阻，始予释放。4日晚，李景林发表通电公开声讨冯玉祥，大骂冯“鬼蜮居心，豺狼成性”，“叛法乱纪，祸国殃民”，是“世界之公敌”，决心“率我十万健儿，声罪致讨”，“惟冯贼玉祥一人是对”。并打出“反赤”旗号，说什么“不问敌不敵，只问赤不赤”^⑯。同时，李还致电奉天报告本人准备即刻开始动作，请张作霖迅以大兵反击郭松龄，以收前后夹攻之效；致电张宗昌请将德州驻军向北增援，会同桑园张宪所部之第三混成旅，策应左侧；致电阚朝玺促其死守冷口，以免热河国民军援郭^⑰。次日又通电声明：“在北京冯逆恶党未肃清以前，所有北京发布命令绝不承认”^⑱。李景林在军事上作了周密部署，以李爽为南路总指挥，马瑞云为北路总指挥，张宪为别动队指挥，缩短战线，在马厂、杨村之线布防，准备战斗。此前，12月2日，李景林将郭松龄解津拘禁之师、旅长全部释放，送回沈阳，并在讨冯通电发出后，逮捕了郭军驻津代表王文元，以此表示对奉张的忠诚。

国民军方面，冯玉祥虽然从反对奉张集团的大局着眼极力避免与李景林部的冲突，但无奈国民二、三军抢占地盘心切，不顾大局，不听劝阻，一意要将李景林逐出天津，冯玉祥的

国民一军也就不能不被拖了进去，为争夺直隶地盘而战。至此，国民军与奉军李景林部之间的战争已经在所难免了。

战争开始，12月6日，冯玉祥派张之江为第一军司令，郑金声为副司令，担任天津北路作战，由落堡进攻杨村，邓宝珊为第二军司令。徐永昌为副司令，担任天津南路作战，由保定进攻马厂。国民三军孙岳部也由陕西开回保定应援。7日，南路邓宝珊部向马厂进攻，遭李景林部顽强抵抗，经过反复争夺，11日攻克马厂。北路张之江部9日分三路向杨村李景林部阵地发起攻击，中路过之纲旅自廊坊前进，左路韩复榘旅自河西务沿武清前进，右路葛锦章旅自安次前进。李军负险防守运河南岸，张部虽然迭次冲锋，仍未得手，次日晨，用猛烈炮火掩护步兵涉水登岸，李军遂不支，向汉沟、北仓退却，张军占领杨村。

激烈的战斗使京津、津浦两路火车停驶，从北京开往天津海口的国际列车也不能通行。帝国主义者以此为藉口公开干涉中国内政。早在1925年1月，日本政府就指派其驻伦敦大使与英国外交部商谈，对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冲突采取一致态度。当国奉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向美、英、法等国政府递交一封信，表示希望在中国问题上建立列强的外交统一战线。日本还派遣曾经担任过国民军顾问的松村少校来中国，向冯玉祥游说，劝冯放弃反奉斗争，维护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但没有达到目的^①。国际列车停开事件发生后，12月11日，各国驻京使团会议推荷使欧登科向鹿钟麟提出抗议。12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小泉又代表各国驻华北军队向国、奉双方提出抗议，以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为依据，要求双方不得在距津二十里内驻军、作战^②。19日，外交使团甚至向国民军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回答开行国际列车一事，并限三天内收束战争，否则实行武力干涉。2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由旅顺派遣日军一营约230名赴天津，接着又派军舰到马公岛、北洋等处，使日本在中国的军舰达27艘之多，海军官兵暨陆战队超过7000人^③。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已经达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而且倾向性十分明显，同在关外支持张作霖反对郭松龄一样，在关内则是支持李景林反对国民军，阻止国民军进占天津。帝国主义的干涉不能不影响战争的进程。

占领杨村的国民军乘胜进击，12日，张之江部三面包围北仓，李景林军依仗坚固战壕对峙，并组织反攻，双方都投入重大兵力，在杨村、北仓间展开极其猛烈的拉锯战，战况空前激烈，双方伤亡重大，仅杨村一地就遗下尸体4000余具。由于日本驻军以修理电线为名，派工兵在杨村附近爬上电线杆窥察冯军阵地，把情况密报李景林的日本顾问上田，因此李军曾一度大胜，攻克杨村、落堡，南路李军也夺回马厂。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下令国民党暂停进攻，静待援军到来。于是，把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等各一部调到天津周围，重新部署围攻天津的战斗。李景林也电请张宗昌派兵支援，张派陈国瑞、徐源泉两军开往青县、沧州一带应援李军。双方都调兵遣将摆开决一死战的阵势。

国民军部署既毕，20日乃下总攻击令，北路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均赴前线督战，其右翼向黄后店、敖咀之线展开，左翼向王平镇展开，中路向汉沟镇展开。21日占领汉沟，22日攻克北仓。南路邓宝珊部同时反攻马厂。这时，绕道唐山、芦台的国民军第九师唐之道部已于14日进占塘沽，19日占领新河，从东面逼近天津，使天津处在被围困之中。形势对李军很不利，因而内部开始发生分化，李军将领多有眷属在天津租界，他们认为久守无胜仗，不愿拼力抵抗，有的已暗与冯军联络，他们以天气寒冷、大炮不易调动为由，不听李指挥。李景林虽亲往前线督战，组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内部不稳，导至大败，向天津市内溃退。24日，李景林下令放弃天津向沧州、德州撤退，自己逃入日本租界。当晚，李景林借日本顾

问上田，往见日本驻屯军小泉司令官，详述战败经过。小泉说：“目前尚有日军八百余人，可乔装李军模样，把国民军入津的先头部队赶出天津。”李哀叹说：“谢谢盛意，但我大势已去，不必多此一举。惟要求退入租界的我部属，请予以保护，本人将赴济南，以后还望多予协助”②。第二天晚上，李景林率部分亲随，乘日轮济通丸赴大连，经青岛，于29日行抵济南。

12月24日，国民军进占天津，29日，孙岳通电就任直隶军务督办，国民军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战胜属于奉系的军阀李景林，应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从反对奉系军阀的主体奉张集团这个全局来看，国民军在这个时候对李景林进行战争，是失策的，它既把已开始动摇、游移的李景林重新推到张作霖的怀抱，助长了奉张集团，同时又拖住了国民军，使其无法实践前约，援助郭松龄向奉天的进军，这正是郭松龄功败垂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冯玉祥在后来回忆这场战争的时候也痛感这是“一场莫明其妙的战争”③。结果，国民军占领天津之日，正是郭松龄夫妇在关外兵败被杀之时，这预示着奉军必将卷土重来，国民军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果然，时隔不久就发生了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联合向国民军的进攻。

注释：

①⑦ 1925年11月30日、12月6日《顺天时报》。

②④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169—170页。

③ 1925年11月10日《申报》。

⑤⑦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196、197—198页。

⑥⑧⑪⑫⑬⑭⑮⑯⑰ 《国闻周报》，第2卷第45期第33页、第46期第28页、第47期第25页、第48期第26—27页、第49期第26页、第50期第30—33页。

⑱ 刘子衡：《张宗昌在军阀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见山东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46—147页。

⑩ 李泰莱：《国民军史稿》，第262—264页。

⑬⑭⑮ 张同礼：《李景林督直及附蒋经过》，天津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08、110页。

⑰ 苏联国防部档案，转引自〔苏〕维·马·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第14—15页。

⑲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441页。

（上接第112页）

⑱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

⑳ 〔苏〕包达包夫等主编：《国际贸易》（上册）财经出版社1957年版，第185页。

㉑⑬⑭⑮⑯⑰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0、101、118、116页。

㉒ 《列宁选集》第3卷，第489页。

㉓ 〔苏〕弗·格·特鲁汉诺夫斯基著：《英国现代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页。

㉔⑤③ 劳合·乔治：《和会回忆录》第1卷，纽黑文1939年版，第37、309、326页。

㉕ 〔苏〕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7页。

㉖ 惠尔普利：《英—美关系》，伦敦1923年版，第173页。

㉗ 哈里森：《稳健的开始》，载于1920年2月号《英国评论》，第175页。

㉘⑦ 迪博：《劳合·乔治与英苏关系发端》，转引自《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5期第34、36页。

㉙ 厄尔曼：《英—苏关系》，普林斯顿1972年版，第164页。

㉚ 《列宁选集》第4卷，第87页。